

李

济

● 李光谟
|| 编

二	十	世	纪
中	国	学	术
文	化	随	笔
	大	系	

学

术

文

化

随

笔

二 十 世 纪
中 国 学 术
文 化 随 笔
大 系

李 济

学 术 文 化 随 笔

● 李光谟 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济学术文化随笔/李光谟编.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0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

ISBN 7-5006-3820-5

I. 李… II. 李… III. 李济-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5344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河北遵化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092 1/32 13.5 印张 2 插页 261 千字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19.50 元

第一编

人类学篇

第一编 人类学篇

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

从一个角度看，中国人不论就民族还是就体质而言，都不属于纯一的种族，就像作为整体的欧洲人不论就民族还是就体质而言都不属于纯一的种族一样。但从另一角度看，中国人就民族和体质两方面说又都属于纯一的种族，就像作为整体的欧洲人在民族和体质两方面都属于纯一的种族一样。我这样说，是为了表明中国人类学问题的重要性不亚于欧洲，解答起来也是一样困难的。

中国的人类学问题很自然的可分为两类：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和中国特有的问题。在我的心目中，更重要的是第二类问题。不过，现在我将只限于探讨具有一般性传统背景并被公认属于人类学的那些问题。理由有三点：(1)这些问题比较容易弄懂；(2)这些问题比较切近；(3)这些问题是过去两年里我在哈佛大学的虎藤教授和狄克森教授指导下研究的课题。

作为人类学探索的领域，中国可以说是几乎还未曾

被接触过。基于这一点,我认为我的第一步工作应该是对整个领域作一番考察,以找出问题的所在。因此,我的这项工作并不是为着去解答这整个问题的任何一个侧面。

我选了五个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得出了一些颇为费解的结果,遇到许多在此之前意想不到的困难。在这篇论文中我打算扼要地依次表述一下这五个方面。如果时间宽裕,我想再说说我认为对中国这个领域至关重要的几个突出问题。

工作一开始,我对 111 名中国人进行了测量和观察,这是一个小数目。但令人惊奇的是,在遍览有关中国人的全部体质人类学文献后,我发现我的这一组是迄今人数最多的,而且整个说来是最准确的一组。有些观测结果是饶有兴味的。举例说,蒙古眼褶并非中国人的一个普遍体质特征,我所观测的人中有 25% 没有这个著名的蒙古人种的褶。此外,我偶尔也看到中国人头发有呈赤褐色的趋势;甚至有蜷曲的头发。但描述这些细微特点将会离题太远。我只能扼要地表述一下对各种可测量特征的分析结果。头形指数、鼻形指数和身高,这三点被选作地区分布研究的标准。为此目的,我搜集了一切能到手的前人所获得的数据。所有这三个体征在中国人身上都显出很大的变量:身高:141—186 厘米;头形指数:66.5—98.5;鼻形指数:50 以下至 100 以上。此外,这几种体征还有着许许多多奇妙的结合方式:长头窄鼻,长头宽鼻,圆头窄鼻,圆头宽鼻。在华南地方,还可以明显看到矮人的痕迹。我并不认为我的数据可以用来保证任何武断的结论,但我认为它们确凿地证实了现代中国人体

征的极端复杂性,而中国人一向被认为是一个纯一的种族。

我说现代中国人的体征这个话是很审慎的,因为今日的中国人不同于 500 年前的中国人,而 500 年前的中国人又有别于孔子时代的中国人。为了探索这个民族学上的变化,我搜集到两套独特的资料:一套可用以说明历史上中国人口规模的变化,另一套则可说明他们的成分的演变。前者是通过比较不同地区所构筑的有防御设施的聚落的年代来进行研究的,后者则通过探溯中国人姓氏的起源而进行研究。对此我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

谁都知道中国有一条万里长城,然而很少有人还知道,在中国的每个地方都造有城墙,有的远在 4000 年以前就有。事实是:当爱琴人刚刚走出石器时代,中国人就在构筑自己聚落的防御设施了。中国过去的历史学家的辛劳,给我们留下了关于建造 4478 座城墙的年代记录。通过对这些年代的比较,我得以勾画出中国本部与三次大规模的筑城活动相适应的考古学上的三条大环带。我发现,这种构筑城墙活动的扩展,可以成功地用来当作历史上的中国人口规模演变的指数。

另一方面,宗谱记录所载的中国人姓氏的起源,也提供了一套说明北方部落逐渐渗入中国地区的资料,举例说,起源于通古斯族的、匈奴族的、蒙古族的姓氏,全都可以找到。

以上述三套资料即人体测量、城墙构筑的年代、姓氏的源流为构架,再加上对 1500 年来中国人口资料和各种历史记载的研究,使我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参加构

成现代中国人的，共有五个大的民族单位和四个小的民族单位。五个大的是：黄帝的后裔，通古斯群，孟—高棉语群，掸语群和藏缅语群。历史上的发展趋势是通古斯群日渐占有黄帝后裔的地盘，而黄帝后裔日渐占有另外三个群的地盘。

我依靠上述五套资料的数据，得以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十分详尽的勾画出上述五个族群的迁徙状况。就这五个民族单位来说，黄帝的后裔即最早的中国人，在孔子那个时代仅见于黄河两岸。这一族群的移动始于公元前2世纪。移动的方向一开始是朝向东南。移动一经开始，就缓慢而持续地向前推进。这场移动在公元3—6世纪这段时间内达到高峰，当时正值蛮族第一次大规模入侵中国。经过这一次入侵，黄河两岸的居民已变得不那么纯一了，他们跟北方和西北方来的一些部落——匈奴群、藏群以及通古斯群融合起来。从这一时期的初始时起，经过800年，即大约在11世纪，发生了又一次的通古斯群入侵，其结果促成整个中国人口的又一次大移动。总的来说，这两次大规模的迁徙，使中国产生的民族变化比任何其他单一原因造成的后果都要大。在这个向东南方扩展的进程中，中国南部的一些土著逐渐被同化了。

以上就是我近两年总的研究成果的概貌。即便从以上关于我所做工作的十分简略的概述中，也可以明显看出，顺着这条路线展现出进行巨大科学探索的广阔天地。在中国这个研究领域，需要有考古学的调查、民族志的调查和人体测量学的调查。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是规模极其宏大的，需要有极大的匠心独运的心智来作出答

案。然而就问题的根本性质来说，这些问题虽说困难，却并非难以克服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个中国人类学者将会感受到另一类人类学问题的巨大诱惑力：这些问题不是那么有形的，而是比较难以捉摸的；是远为重要的，却又不太容易用现代科学词汇加以说明的。不过，我还是试着尽我的可能把这个问题说得明确。我所指的就是关于中国语言的研究，以及关于中国文字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的研究。

在欧洲科学家的心目中，语言历来只被看作声音的集合，而不被看作是某种比发声器官更内在、更深刻的东西的表述。在文字研究这个领域，亚利安人的语言学家恐怕长时期以来就相信拼音文字是迄今最好的文字，它代表人类全部智力活动的最高成果。或许另一行星上的某种人类可以判断此话的真实程度如何。可是一个中国人很难无保留地接受这种看法，因为他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他会用大体这样的方式来争辩：拼音字文明只是文明的一种，而不是整个文明。同样，拼音文字只是文字的一种，而不是一切文字。在这个基础上来区分世界现有各种族的文化，就会发现使用拼音文字的人和使用象形文字的人之间的根本区别。西方文明的历史表明，拼音文字的长处是它能容纳种种变化，但与此相应的短处是它不能持续地支撑一种思想。拼音文字的过度流动性，至少要为西方历史上的许多动荡起伏承担部分责任。中国人的历史表明，象形文字的主要长处是它作为某种最终的、简单明了的真理的化身，经受得住各种冲击和压力，而它相应的短处就是抵制变化。整个的拼音

字文明可以被称为一种检索式文明，而象形字文明则是一种图像式文明。在现代社会，检索式文明自然大大优越于图像式文明。现代社会可以不要艺术、文学、道德和宗教而存在，但却不可一日无检索系统。早上把检索系统破坏掉，不到半夜现代社会就要垮台。我不信有谁会知道：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之所以如此缓慢，基本原因之一在于它的文字不能检索化。因为现代文化就意味着科学和机器。但这两者离开检索系统都不能运转，而中国语言却无法提供它。然而，这正如吉卜林先生所说，已经是题外的话了。

现在回到我原来的题目上来：前面的议论的目的，是想说明拼音文字虽然这般奇妙，但功能毕竟有限。既然功能有限，就不能视它为无所不能。这还意味着：一方面，那些自称客观上可靠的所谓对文化的科学解释，经过进一步的分析，十之八九暴露出一种语言文字上的偏见，不过是一堆装腔作势的废话。另一方面，拼音字文明的本性与拼音文字的本性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同样，象形字文明和象形文字之间，也是如此。我从下述三个方面取得对我这个论点的进一步支持：(1)数理逻辑表明，一切严格的逻辑思维要用数学符号来表示，而不能用拼音文字表示；(2)行为心理学表明，一切思维活动，包括拼音的思维，只是一种行为类型，而不是一种神秘才能；(3)内省心理学表明，在语言符号，与思想的发生、成长、形成和变动二者之间，存在着十分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样一来，我们不能不得出如下结论：文字对较高文化发展的影响问题，是一个极重

要的问题。如果认真地看待它，可能有助于解决“心理上的一致”这个问题——这个字眼人们用的不少，却又懂的不多。我没有时间在这里详谈解决这一问题所需要的方法。不过我这里冒昧的做个预言：今后三十年里，如果中国人能对人类学的研究作出什么贡献的话，最要紧的将是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

（原文为英文，1923年发表于《哈佛研究生杂志》卷31期123；李光谟的中译文，现收在《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1990年）

第一编 人类学篇

难题所在

编者说明：本题及下一题(及其附表)摘自李济的博士论文。论文的中译本在1997年方才面世，全文约22万字。这里摘选很少一点介绍给原作出版70年后的读者，特作说明如下：

一、书中提到的18个省，是截至公元1644年(清建立国号时)的区划(又称“中国本部”——China proper)。B.C...H等七个时期，是对公元前722年至公元1600年之间的时期划分；A 时期指的是公元前722年以前。

二、中译者张海洋、胡鸿保在篇前的“声明”中特别指出了文中提到的民族与现下研究结论的明显不同之处：(1)鲜卑与匈奴、契丹、蒙古等族现列为东胡族系，满族列为通古斯；书中提到的通古斯多数指鲜卑族。(2)苗、瑶两族语言现归为汉藏语系的苗—瑶语族，而不列为南亚语系的孟—高棉语族；译者认为书中所言孟—高棉族人在华中华南的迁徙，实指苗、瑶族先

民的活动。

三、原作者全书中借用萨姆纳的“我群”、“你群”的划分，完全是民族志意义上的。

读者可以细读一下这里介绍的第一章。

历代以来，中国史的研究都仅仅是从一个角度进行。但自从东方学派在欧洲兴起以来，一种不同的角度得到采纳，并由此而出现了不同的视野。这两种立场相互之间是全新的——其间诚然并无公开冲突，但确如两极一般天差地远。全面权衡之下，优势似乎落在东方学家一边，原因全在于他们除了对中国历史的知悉之外，还对其本国的历史有所了解。相形之下，中国的史学家迄今为止很少能超越中央王国的界限。受到对其他文明中心的无知之限，中国的史学家有着与埃及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一样的人性上的弱点，将自己的国家视为世界的中心，而把外国人视为野蛮人，仅仅在他们同中国发生某种关联时才对他们产生兴趣。一旦理解了这种观点，全部的中国历史便显得易于领会，甚至欧洲人亦可读懂。当然，东方学家们也多少被中国史学家们这种似乎无端的臆断所激怒，从而发展出一种看待中国人的固定观点：“他们全无历史意识，他们一成不变，他们的文化在一个静止不动的水准上停留了4000年之久。”等等。

显而易见，上述两种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如果不是它们在事实上搞乱某些人类学问题之嫌的话，我们本来不必考虑它们。例如，说中国人一成不变达数千年之久，便会直接抹杀有关现代中国人的体质构成以及与

他们在其相当久长的存在过程中的人种变化有关的全部问题。这可能有助于简化科学家的任务，但肯定无助于逼近问题的答案。公正地讲，现代中国人的形成不能仅仅因其显而易见的体质上的同一性而作为皮毛小事不予考虑。从体质上讲，他们并不像初看之下那样纯一，他们的民族志更是充满起伏跌宕。这一形成过程本身就是个极大的人类学问题，并且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即使我们仅仅着眼于所知较多的那一部分，那也是一个至少长达2600年的过程。李雅各(James Legge)在其翻译的《诗经》序言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即我们所谓的中国本部，包括了18个省份，大体上可以说是坐落于北纬20到40度、东经100到121度之间，所占面积约达130万平方英里。周代的中国位于北纬33到38度、东经106到119度之间。其中所包括的经度约为现在的2/3，而在现今的二十个纬度当中，周代领土所及不过五个。”^①

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现今所有生活在北纬20到40度、东经100到121度之间的居民，都是2600年前占据着北纬33到38度、东经106到119度之间领土的人们的后裔吗？肯定的答案总是与下面这类不确不实的表述大同小异：“现今的中国人就是他们4000、3000，或2000年前的祖先们的模样。”如果这是真实的，那么我在这里所建议承担的任务，就充其量也不过是从一种增倍繁育的简单生物学现象中来辨认现代中国人的形成过程。现代中国人的形成这一问题，也就不外乎是其生活早被《诗经》时代的诗人所歌唱过的那些中国人的形成的问题了。然而，我认定这不是真实的。中

国人远远不是在 4000、3000，或 2000 年里一成不变的。哪怕在 1000 甚至在 500 年里也不是的。在其扩展的过程中，他们一直在征服、被征服和再征服，使自己适应新环境并重塑其文化，所到之处，他们都吸收了新的血液。因此，关于中国人的形成，是存在着真正的问题的。在这一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像许多人所做的那样探讨中国人的起源是毫无用处的。

这样做之所以无用，不仅仅因为它本末倒置，还因为除了有关地理分布之外，根本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何谓中国人。人们不能靠对其姓名的词源由来的研究来界定他们，因为照一位在这方面花费过大量时间的著作家的说法：“词源学研究仅仅是第二或第三手的科学研究”，^②况且其价值充其量也总不过是语言学上的。为妥善研究这一问题，对中国人的体质特征的考察看来是惟一合理的出发点。为了确立一个关于中国人的体质状态的坚实概念，必须对中国人的头形、中国人的身体、中国人的手和中国人的脚加以研究。没有一个坚实的关于中国人的体质人类学的概念，就很难看出我们怎样才能研究他们的起源。

但是，出发点毕竟只是个出发之点：它帮助我们建立起中国人的类型以及他们与其他人种的联系，仅此而已。它只能定义静态的人。对于活生生的人，人的动态方面，则只能通过生物学之外的办法，或许可以称之为民族学的方法来加以研究。其实名称倒无关紧要。让我们看看它能做些什么。

如同前面业已指出的，中国的史学家总是把他们的

国家看成是世界的文化中心。但他们也意识到了周边其他人类的存在。从中国历史的开端时起，他们的头脑中就有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志概念。一个，在这里借用萨姆纳先生的贴切借词，可以称为“我群”，即被中国的史学家们视为同类的文明人的群体。而他们所谓的野蛮人，在我们看来便可以称作“你群”。^③在此必须强调的是，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分野并非总是政治的分界。毫无疑问，在很多情况下政治疆界有助于廓清我群的边界，但因所处的场所不同，它也并不总是如此强大的同化力量。几个特点鲜明的族群共处于持续变化着的中国版图之上的情况，是任何一个研读中国历史的人所熟知的。即便是现在，也还有至少五个不同的族群共处于中华民国的旗帜之下。

因此，这样的群体划分完全是民族志意义上的。在中国史学家们的观念中，有些民族志方面的特质总是与我群相联系的。任何具有这些特质的人，无论其体征如何，无论是黑人还是红发人，都被划入我群；而没有这些特质的，便是属于你群的野蛮人了。

然而，尽管中国人有保守观念，与我群相关的民族志特质也远非在任何时候都一成不变。例如，把《诗经》时期的中国人的行为与他们在唐代的后裔相比，再与人们在19世纪末所观察到的蓄辮子的男人和缠足的女人相比，其间的巨大鸿沟肯定需要许多年才能跨越；而且，以他们不断变化的眼光来研究这些变化着的民族特征，对于解释现代中国人的形成过程都是有用的线索。